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 / 潘洪林著.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0211-580-4

.科... .潘... .科学哲学 - 研究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 203906 号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

出 版 人 : 和 龔

责任编辑 : 郑 锦

责任印制 : 尹 琨

出版发行 :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 (010) 66509353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市印刷一厂

开 本 : 787 × 960 1/16

字 数 : 190 千字

印 张 : 17.75

版 次 :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 010-66509618

内容提要

自 19 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社会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对其现代化的方案进行反思。他们从文化的角度对西方社会展开了批判，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社会的危机就是理性的危机，是科技理性僭越了价值理性的危机。“技术统治”、“知识霸权”、“工具理性”、“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等成为流行话语，交织而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反科技理性思潮。西方学界在这一论题上处于全球话语霸权的地位，其反科技理性的论调对我国学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本书以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为事实背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梳理了中、西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进行了学理性的解读，吸收了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的合理要素，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主干上的两大枝干，是人类把握外部世界和人自身的两种能力，两者统一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西方学界不仅片面强调了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性，而且设置一个前提性错误，是在赋予西方价值理性具有先天合理性的前提下，对科技理性进行批判，从而得出了科技理性就是工具理性的结论。本书摆脱了西方话语的控制，提出了价值理性工具化的观点，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际，以价值理性为工具实施侵略和扩张的事实；提出了中国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建构策略，一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二是营造精神家园；三是建设生态文明。本书在方法论上始终坚持历史分析方法，并揭示了西方学界普遍采用的抽象方法的局限性。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框架	19
● 第一节 理性与理性主义	19
一、理 性	19
二、理性主义	22
● 第二节 科技与科技理性	27
一、科 技	27
二、科技理性	36
● 第三节 价值与价值理性	40
一、价 值	40
二、价值理性	47
第二章 西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兴起与性质	51
● 第一节 西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兴起	52
一、产生背景	52
二、社会动因	56
● 第二节 西方科技理性的作用	60
一、西方科技理性的进步性	60
二、科技理性的扩张	73

● 第三节	现代西方社会价值理性的性质	81
一、	西方价值理性的进步性	81
二、	现代西方价值理性的内在缺陷性	86
三、	西方价值理性的新趋向	98

第三章 西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问题分析 103

● 第一节	西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理论溯源	104
● 第二节	西方学界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关系的误读	110
一、	两种文化对立的误读	111
二、	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误读	116
三、	科技理性僭越价值理性的误读	117
● 第三节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	119

第四章 西方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 127

● 第一节	超越理性	128
一、	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兴起——非理性主义对理性的反动 ..	129
二、	非理性主义的最新形态——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消解 ..	132
三、	用新理性超越传统理性	135
● 第二节	超越科技理性	140
一、	内在超越	141
二、	外在超越	142
● 第三节	超越价值理性	155
一、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155
二、	对传统伦理思想的超越：生态伦理	161
三、	生态伦理学的中国化	166
四、	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	173

第五章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在中国的沿革	177
● 第一节 凝重的价值理性	177
一、传统伦理精神	177
二、传统价值的当代转换：诚信建设	182
● 第二节 科玄论战的意蕴	187
一、科玄论战的背景	187
二、科玄论战的实质	191
● 第三节 人文精神的呼唤	196
第六章 中国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现代建构	201
● 第一节 弘扬科技理性，实施科教兴国	202
一、信息时代的理性特征	202
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216
● 第二节 重视价值理性，营造精神家园	231
一、维护文化主权	231
二、推行道德建设	239
三、确立核心价值观	247
● 第三节 培育生态伦理，建设生态文明	250
一、建设中国的生态伦理	250
二、中西融通下的生态伦理建设	257
三、践行生态伦理精神，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263
结 语	271
参考文献	273

导 论

一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奠定了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此人类文明的成果无不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创造奇迹,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态势。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西方国家铸就了工业文明的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因重视科学技术而得到飞速的发展,成为能与美、英、法、德等国分庭抗礼的发达国家,这一切为现代科学主义提供了注解,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被广为传颂。科学技术在铸就极大的物质丰裕的同时,也使西方社会不断产生出文明的病痛,与工业文明进步相伴而生的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性的异化,面对这些根深蒂固而又日益蔓延的社会问题,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和恐惧成为西方流行社会思潮。德国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就用一种历史宿命的观点诠释了西方社会的未来,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中认为,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阶段。

自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近代科学技术得以产生并突飞猛进地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得到了高速增长。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折,西方人依靠科学技术创造了物质财富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能力,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自然界中攫取物质和能源。然而科技理性并没有完全像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把人们引向自由幸福的乐园。“无疑这是一个理性与技术的时代,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科学和技术并不能解决那些在最近如此凶险地威胁着我们的棘手问题。科学和技术在这个事实面前完全是无能为力的,相反,它们正

如此可怕地煽动起各民族、种族和文化之间的战火。”

20世纪上半叶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人对社会进步的观念发生了动摇,科技的军事化应用,直接导致战争的大规模屠杀,人权、平等的理想神话如泡影般幻灭了,理性走向了黄昏。在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如现代德国历史学家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所说:“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最初的10年间,欧洲一直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空间。它是无可争议的世界中心。每一个曾经体验过这种精神生活的人,都了解彼此之间共同的文化,所有的人都读着同样的书和同样的哲学论著。”登霍夫的话虽然表达出他对欧洲中心时代的眷恋,但却反映了符合历史真实的一面。战争的恐怖和工业文明造成的高效率与理智化的非人道,给西方式的乐观和自信予以了致命的打击,终结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神话。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动荡不安,难以寻找到精神的栖居地。

战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阶段性的,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外在自然和内在人性的破坏,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自19世纪以来,美丽的大自然在工业文明的洗劫下已经是满目疮痍,自然环境严重污染,大量的废气、酸雨、烟雾严重威胁人们的身心健康;生态平衡惨遭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物种灭绝、旱涝灾害频频发生。与此同时,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已经突现出来,诸如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资源枯竭、核威胁、战争暴力、贫富悬殊、技术统治、吸毒贩毒、精神颓废、邪教猖獗等现象普遍地困扰着人们。这一切都说明,西方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面对全面的社会危机,西方人开始反思,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提出了质疑。

西方社会的种种危机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在向全球蔓延,科学技术又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新的更加棘手的问题随之而来。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相隔仅仅二三十年,到7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空间

〔美〕A.H.马斯洛:《人类价值新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德〕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开发技术等高技术群落就纷纷崛起,第四次技术革命又来到了。E.拉兹洛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的10年,“世界上那些先进的社会都已经彻底地‘信息化’了。它们不再仅仅是社会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而且还是信息加工系统。”信息社会已经从未来学家贝尔的预言中变成了现实。现代人建构了一个数字化的、网络化的世界,用尼葛洛庞帝的话来说,数字化生存时代已经到来,而且我们无法阻止它的到来。在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财富创造系统中,劳动力的成本在生产总成本中的比例不断缩小,发达国家因拥有世界科技成果的绝大部分,竞争能力不断加强。与之相伴,电脑黑客和电子炸弹在网络世界中游弋,痴迷网络的网虫们对现实的人世生活产生冷漠,特别是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毒害已经与毒品的危害处于相同程度。20世纪末期,科学技术的几大突破更是令世人胆颤心惊,1997年2月,克隆羊多利的产生使克隆人的生产已经不存在技术性的问题;1997年5月,名为深蓝的机器人战胜了独步天下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演绎了一场世纪末的人机大战,其结局多少有些悲凉;世纪之交,关于转基因食品问题的论战硝烟未散,人类基因组计划工程又连续发生撞机事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何使用这一科技的成果,令世人关注。科技发展的同时,世界上人为灾难与自然灾害,更让人触目惊心。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世贸中心的摩天大楼,轰然倒塌,化为一片废墟,造成了3000多人丧生。2002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在中国流行的SARS病毒,夺取了数百人的生命,无论是人们的心理还是社会机制都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海啸在瞬间夺取了30万人的生命。2003年3月19日,美军派遣军机大举轰炸巴格达,发动伊拉克战争,战争造成了400万难民,引发了世界上恶化速度最快的难民危机。这一切似乎都说明科学技术不仅无法完全抵御自然对人类的残害,更无法改变人类之间的相互残害。

〔美〕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21世纪的生存抉择》,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

现代科技的应用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现代交通、通讯和信息变得十分快捷,而且正改变着经济的形态,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崭新话语正在全球扩散。与此同时,信息技术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支持,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信息的及时传输加强了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企业营销的国际化。在当今时代,离开世界市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难以得到发展。经济的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是也充满了风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强大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对不发达国家在经济上进行不等价交换,利用全球化人为制造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攫取超额利润。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仍令一些发展中国家胆寒。20世纪晚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利用科技和经济的实力作支撑,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文化上施加影响,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念,成功实施了和平演变战略,使全球社会主义阵营遭受重创,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推行文化入侵,展开意识形态的攻势,并以人权为借口肆意推行霸权主义,动辄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封锁,甚至不惜以平民的生命为代价,实施疯狂的军事打击。科学技术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扮演着“资本的帮凶”的角色。在当今国际舞台上,西方发达国家展现出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的同时,也展现出了最野蛮的反民主、反人权的行径。

二

西方学界对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造成的深层影响予以了广泛的关注。在西方哲学界,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学派,对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科学技术本质、科学技术对文化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形成了科学学、未来学、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新兴学科;另外,从人文的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所形成的人文主义学派影响非常广泛。这些西方思潮以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对中国学界的影响较大。

西方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上，一是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对技术的本质进行哲学的反思；二是从社会理论的角度，对技术的发展因素进行分析批判。关于技术的本质问题，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观点对学界的影响最大。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流行观念提出了质疑，流行观念对技术作出了工具性和人类学的解释。他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不是作为“目的的手段”，也不是“人的行动”，而是以无情的力量驱使人行动的“座架”，在技术时代不是人控制技术，而是人被完全束缚在技术的框架中，受技术的统治和支配，不自觉地按照技术的需要去行动。“海德格尔反对这样一种观点：人能进入到与技术和科学的独立关系中。技术不仅仅是人类的事务，在根本上，人原本已经被放置在揭露的方式中。”海德格尔面对现代技术无所不在的状况，独辟蹊径对传统的技术工具性和人类学的解释进行了超越。他用“座架”这个概念来解读技术的无处不在，是其创新所在。而海德格尔对充满危险的技术统治时代的前景，还是充满信心。“海德格尔追问危险如何被克服，以及在哪儿找到解救。他同意诗人赫尔德林的说法：‘哪里有危险，哪里同样生长着解救之力。’”但是，如何解救呢？“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看到，技术本身不能带来解救，而只有对技术本质的‘反思’才会提供前途”。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解读，在晦涩中带有一份睿智，在悲观中带有一份希望。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的思想，是以技术决定论为基础，“座架”的先存性就是技术的先存性，这就预示了人类无从逃避技术的决定。面对无所不在的技术，海德格尔主张用“反思”作为超越技术的途径，可见他要用精神的力量去摧毁物质的统治，他的乐观主义大厦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沙滩上。

以欧洲科学危机论著称的德国著名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年）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对科学技术实施了批判。他说：“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

〔荷兰〕E.舒尔曼：《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同上，第93页。

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虚假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胡塞尔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片面追求物质的享受而轻视精神的需求,导致了人的精神的空虚和人生意义的丧失。在科技理性的主宰下,一切带有主观色彩的价值问题均遭到拒斥。胡塞尔说:“如果科学只承认以这一方式客观地可确证的东西为真的,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精神世界的一切形态,人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和规范,就像瞬间的波浪自涌自息,以及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理性一再成为胡闹,欣慰一再变成烦恼,它过去是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话,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对此能平心静气吗?我们能在一个其历史无非为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的不尽锁链的世界中生活吗?”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批判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鲜明地指出了实证主义对社会价值理性的蔑视。但是,胡塞尔的一个明显的思维路径,就是要将整个欧洲社会的危机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危机,归结为理性的危机。那么解决欧洲的危机也就是要解决科学的危机和理性的危机,这也是西方理论家在科学技术问题上的一种代表性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也是沿着这条思路,对科学技术实施具体的批判,以代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以批判理论为特征,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重新“革命化”。该学派认为20世纪人类所面对的压迫远比马克思的时代更为复杂,在当时反抗压迫的一个鲜明的对象是资本家,而现在人类面对的是无形的但却是无所不在的科技理性。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文化的批判,把科学技术指认为意识形态,成为该学派最具代表性的见解。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文明阶段,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已经从经济、政治上的统治转为一种技术性的统治,技术进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是一种更具欺骗性、更具维护功能、更难以消除的新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意识形态正逐渐取代资产阶级

〔德〕E.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同上,第6—7页。

旧的意识形态,成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批判,首先,科技理性把自然作为主体的对立物,萌发了强烈的控制自然的欲望,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科技理性对自然的肆意干预,导致了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其次,科技理性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极大地满足人们的物欲,在世俗化的社会中科技理性获得了至高的地位,科技理性成为了判明一切学科和所有社会行为合法性的唯一尺度,科技理性僭越了价值理性,使其他一切学科臣服于科学。再次,科技理性支撑的工业社会,剥夺了人的自由,使人在技术统治下成为了单向度的人,文化的工业化使人失去了创造性。法兰克福学派揭示了科技理性对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借鉴意义。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用批判的目光来审视资本主义制度,这较之于那些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具有先天合理性的西方学者来说,在出发点上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由于该学派所作的批判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之上,并企图用对现代科技理性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就决定了法兰克福学派不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实质性的批判,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辩护。

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注科学技术就是关注时代,关注人类的生存。这是中外所有哲学工作者应该关心的课题。我们看到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但是由于从近代科学技术兴起到现代科学技术的辉煌,不过几百年的历史,其变化之神速令人应接不暇。因此,人类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评价还远未达到其本质和客观的状态。西方现行对科技反思的理论可谓是林林总总,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技术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等各种思潮风起云涌。

本书旨在对西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进行历史性的梳理,建立一种具有中国价值特色的理论平台,以便对当下流行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辨析,为我国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建构扫清理论障碍。需要指出的是,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问题在当代显现,是基于西方社会面临了种种危机,许多西方

学者寄希望通过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问题的解决来克服社会的危机。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往往是侧重于揭示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冲突的一面。为了有针对性地对有关的西方思潮进行剖析,我们把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论题,但是我们并不认为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是西方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问题的探究存在两条思维的路径,一是从学理上去寻求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二是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去分析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本文侧重于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对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注重现实性和针对性。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上,本文力图超越西方学者的视界,一是不再拘泥于对科技理性的负面作用进行挖掘,而是把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置于同一平台之上,进行同等的审视。二是不再把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问题限于西方社会内部进行分析,而是把这一问题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科技理性已经全面渗透进社会的各个层面,科技理性的工具化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人性在科技理性的扩展中遭到扭曲,“平面化”、“单向度”成为西方人的生存样态。外在自然的破坏和内在人性的失落,使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困境。科技理性的高涨与价值理性的失落,使西方社会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西方社会面对难以自拔的生存困境开始反思其现代化的历程,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西方社会提出的“现代性方案”(the project of modernity)开始遭受普遍的怀疑。西方人固有的本体论思维定势左右其反思路径,开始探寻现代化之源,分别从宗教思想、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等相干因素进行追溯,最终科学启蒙精神被推上了审判席。对科技理性的反思一开始就形成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峙,在此后谋求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成为西方学界的一种理想追求,环境伦理主义、科学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在追求这一理想的目标。西方学界对科技的反思基于其工业现代化之上,对科技的发展所造成的自然界的破坏,以及科技的发展对人性构成的伤害,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些思想对我们正在推行工业现代化的国家来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理论的立足点是

建立在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上的,他们倾向于把西方社会的危机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危机,而没能从资本主义的制度的本质缺陷上进行批判分析。

西方社会以科学文化为主导文化,对科学的言说居于话语霸权地位,其对科技理性的反思有相当的影响力。西方社会对现代化历程的反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科技理性并不能造就一个完美的世界。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勃然兴起的科技理性,在为人类生活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把人类推向了危机的深渊。那么面对西方社会的困境和全球性的危机,科技理性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过错,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当然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西方学界依据其独有的科学文化和历史背景资源,对科技理性的反思有独到的一面。但是,我们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把诸多的社会问题全部归咎于科技理性是不妥当的。西方学界对科技理性批判的前提也是值得怀疑的。在他们的视阈中,科技理性是作为价值理性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只能是价值理性的审判对象。与此同时,价值理性却具有先天的合理性,这样他们的文章就只能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去做。因此,西方学界对科技理性的批判就必然会带有相当的片面性。事实上科技理性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科技理性的扩张正是在价值理性的导引下才能得以实现。在西方价值理性的导引下,其科技理性造成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其自身社会范围,直接对国际社会和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西方社会该当如何承担职责,值得反思的不只是科技理性,而更重要的是其价值理性。然而,西方学界却很少对其价值理性作出深刻的反省,相反,许多学者却把价值理性的过失一股脑儿记在科技理性的名下,甚至把功利主义也说成是科技理性的必然产物,而功利主义明显是一种价值观。到底是功利主义导致了科技理性的偏狭,还是科技理性促使了功利主义的兴起,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明了的问题。

事实上科学技术也内含人文的向度。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是在近代科学兴起后最早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西方哲学家,他在其奠基性著作《人性论》中阐发了科学对于人性的影响,他这样写道:“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

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在逻辑、道德学、批评学和政治学这四门科学中,几乎包括了一切需要我们研究的种种重要事情,或者说一切可以促进或装饰人类心灵的种种重要事情。”

科学在现代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中最为耀眼的文化形式,人们主张不仅在物质层面,而且在精神层面来理解科学。正如萨顿所说:“确实,大多数的文人,而且我也遗憾地说还有不少的科学家,都只是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却不去思考科学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内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现在我要说,在过去的科学著作中发现的那种没有也不可能被更换的东西,也许正是我们自己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就像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和宗教的生命一样。”萨顿要求把科学和艺术、宗教作同样的理解,也就是要作文化的理解,因为艺术和宗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文化现象。

科学史和人类文明史的关系日益清晰,萨顿鲜明地揭示了这一关系。他说:“按照我的理解,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最高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作为背景而存在。”在西方文化的发展史上,科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这一点不仅在现实层面通过现代科学革命对现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出来,而且在西方文化形成初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在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的创造性的活动决定着人性的面貌。正如卡西尔所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

〔英〕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7页。

〔美〕G. 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美〕G. 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琪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30页。

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人类文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由科学、艺术、语言、神话等方面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创造人类文化历史的活动,在创造文化历史的过程中就同时把人塑造成了文化的人。

现代人类在科学文化的创造中表现自己的本质,人类生存的合理性是以符合人类本质的要求为依据。人的本质决定了人该怎样生活,而不能对人的生存合理性进行抽象的设定。在工业文明兴起以后,一些人文主义者把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设想为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进而要求放弃科学技术,回归自然,这正是对人类生存的合理性进行了抽象的设定,人的本质一定要通过人所创造的文化表现出来,文化的创造力是人一种最本质的力量。长期以来对人的本质追问一直囿于传统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久远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把理性作为人的本质,而近代非理性主义哲学也未能摆脱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只是用非理性来取代理性作为人的本质。文化人类学强调了人的创造性,人的本质在于人的创造。因此,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体现了人的创造性的本质,也是科学的人文向度最为突出的表现。

20世纪科学技术与社会价值的问题在中国也曾几度浮出水面,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90年代前后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国内学界对这一课题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其中我国著名科技思想史家林德宏教授对该论题作过深入的研究,他说:“现代技术危机的实质,是价值危机、伦理危机,是人类命运的危机。”林德宏教授立足最新科技发展的状况之上,完成了一部有影响的力作——《人与机器——高科技的本质与人文精神的复兴》,林德宏教授明确地表达了该书的主题:“在高科技条件下强调人文精神的复兴,强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是本书的主题。”林教授从人、机器、文化的角度透彻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页。

林德宏:《“技术化生存”与人的“非人化”》,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林德宏:《人与机器——高科技的本质与人文精神的复兴》,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11页。

地分析了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另外,国内学界对科学技术进行深入反思,有一定影响的成果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高亮华的《人文主义视野中之技术》和2000年出版的孟建伟教授的《论科学的人文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肖峰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等。对于科学技术的反思研究,从总体上看国内学界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视角还不能完全摆脱西方思潮的左右。西方学界提出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文化冲突的理论,基本上成为国内在该论题研究上的理论前提,研究的中心局限于揭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冲突,进而致力于寻求两者之间的融合。应该说这类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它对于纠正科学技术发展的褊狭非常有益。但是对于科学技术的反思,应该突破认识论的界限,要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来研究,才能深入其本质。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建立一个以现实为依据、以实践为旨归的理论平台,才能对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

三

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思维路径,侧重于强调科学技术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科学技术不仅被看做是人们活动的物质资料的总和,而且被看做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类型、性质是与具体的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连的。马克思在探索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时,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学技术对资本的从属地位,并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马克思明确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学从属于资本。马克思指出:“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马克思的精辟断言对于我们理解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学从属于资本,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6卷下册,第229页。